

ZHONGXIFANG
文论话语比较研究
WENLUN HUAYU BIJIAO YANJIU

李江梅·著



云南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中西方
ZHONGXIFANG
文论话语比较研究
WENLUN HUAYU BIJIAO YANJIU

李江梅·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组稿编辑:陈光耀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雯 冉

责任校对:宋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方文论话语比较研究/李江梅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01-009256-0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文艺理论-比较文学-中国、
西方国家 IV. ①I0-03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6324 号

中西方文论话语比较研究

ZHONGXIFANG WENLUN HUAYU BIJIAO YANJIU

李江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7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256-0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	(13)
第一节 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型语言	(13)
第二节 显象与显序	(32)
第三节 “得意忘言”与“语言依赖”	(48)
第四节 “言象意”走向与“意象言”走向	(65)
第二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意	(75)
第一节 经验与先验	(75)
第二节 “悟”与实证	(90)
第三节 诗性引导与指称主导	(107)
第三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思维模式	(126)
第一节 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	(127)
第二节 关联思维与实体思维	(143)
第三节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	(159)
第四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空间	(173)
第一节 虚空与密实	(173)
第二节 模糊含蓄与精准确定	(193)
第三节 散点游目与焦点透视	(217)
第五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文化规则	(239)
第一节 “无中生有”与“有中生有”	(240)
第二节 “依经立义”与“逻各斯”中心	(261)

第三节 “依史论文”与“依哲论文”	(283)
第六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文化语境	(297)
第一节 话语主体的生存状态	(298)
第二节 主流哲学	(313)
第三节 政治经济状貌	(329)
第七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主体的心灵建构	(339)
第一节 “内圣外王”与“求真知真理”的两种人生 目标	(340)
第二节 士人人格与知识分子人格	(348)
第三节 讽谏心态与批判精神	(355)
第八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比较的意义	(363)
第一节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融通互补	(364)
第二节 中国文论话语的转换重建	(371)
后 记	(377)

导 言

21 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在这一时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通将日益加快其节奏,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新格局。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中西方文化不断相互对话和渗透的历史。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世界文化的一种互补结构,它们在长期的对话中互释互补,各自走上了辉煌的发展进程。但在近现代西方文化强势席卷全球的冲击下,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的环境遭到破坏,西方文化霸权的地位日益明显。而随着后现代语境的出现,不同民族文化向西方文化霸权发起挑战,形成了要求平等和对话的时代潮流。比较文化和比较文明的研究因此就成为了 20 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研究的一大热点。中西方文论的比较研究便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研究热潮中被学者重新认真审视的领域。

中西比较文论的研究,是近三十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和热点课题。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叶朗教授、曹顺庆教授、黄药眠教授、童庆炳教授等人都有创见性的、启发性的论著见诸学界。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传统文论的比较研究中,各取不同的视角和依凭不同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取得了引领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我们已经拥有了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的相对丰富的研究实践。然而,对中西方文论的多角度、多侧面、多视野下的研

究,仍然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并且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扩展空间。尤其是在今天学界热议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与中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等问题的氛围中,这种比较研究的延续、发展和创新,更加显得必要和重要。

中西方传统文论的比较研究,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平行研究。因此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恰当而独特的平行比较基准,是比较研究的先决条件。从“话语”层面进行文论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最切近文论实际的、新的角度和视野。因为文论及其交流是在言说与闻言说中存在的,面对着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首先是被其概念、范畴所包围,我们必须通过这些概念、范畴去获取这一文学理论的整体面貌和概要思想,所以,从文学理论的话语出发来审视、把握它是切中了问题的关键。文学理论研究赖以凭依的表达方式、范畴体系都应归在“话语”之下,而文学理论话语理论则是以文学理论话语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范型。因此,文论的话语及其理论在话语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认识与了解,首先是从它的话语范式着手的。所谓话语范式是指话语被结构组织成一种有效的外在表达方式。阅读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著作,最先全面而直接作用于研究者(阅读者)的就是文学理论的话语范式。只有先牢牢抓住了文学理论话语范式这一外在的表达方式(形式),方才有了通过这一方式(形式)而把握住文学理论自身的很多东西(内容)的可能。因而,文学理论的话语范式成了文学理论内容的外在形式,理解话语范式则是为文学理论勾勒出了一一种外部轮廓,由此能够还原性理解文学理论本身的东西。无疑,这是理解文学理论不得不做的基础性理论工作。对话语范式的认识与理解,就必须认识和理解话语范式的媒介形式:语言。任何话语范式都必须借助于某一语

言而得以表达、展现出来。语言在话语范式与思想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每一思想需要某一特定的话语范式,某一话语范式表达某一特定的思想,语言使二者的对应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限制。由此可知,对某一文学理论的理解与建设最终是要从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着手,方才抓住了最根本的原点。在理解某一文学理论的话语范式,即进入这一话语范式的思维图式之后,接下来该展开的工作则是确定、理解话语里的概念及其生成的范畴并由此审视、分析所形成的系统。范畴在话语范式里以概念的形式展开并在话语范式所生成的理论语境里形成逻辑秩序上的诸多关系(联系),并且进而形成逻辑关系网路,于此,理论体系被完整地支撑起来了。实际上,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这样一个范畴→范畴关系→范畴关系网路的过程。从逻辑的层面上讲,理论体系即是范畴关系的逻辑网络。因此,只有理解了范畴及其逻辑关系,才有了进入到理论的体系里系统地整理思想的可能。从外在形式层面上看,话语范式经由语言同思想建立起内在的对应关系;从内在内容层面上看,由关键概念生成的基本范畴及其逻辑关系形成理论的体系。加之,概念及范畴只有在话语范式所生成的理论语境里才被确定特定的身份而获有了意义,而理论的系统性的根本目的与外在表现则是条分缕析地诠释思想。明确了话语对于文论研究的特殊意义,人们在研究文论时便对“话语”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将文论的话语研究当成了当今文论研究的最重要的切入角度和审视的视野。

从中国当代取得的文论研究实际来看,针对文论内涵和意义的比较研究甚多,针对中国或西方文论话语的独立研究亦很丰富,但从话语角度比较中西方文论,找寻两种文论话语的特色的研究,还是一个很值得拓展、延伸的领域。对两种文论话语的比较研究,

对重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话语体系,无疑具有参照和取样的意义。中国传统文论历经数千年,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特的理论视界、独特的术语范畴、独特的致知方式、独特的趣味标准和独特的表达方式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悠久的文学艺术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论术语,而且还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印记的文论话语体系和框架。这种体系和框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同理,具有文化色彩的西方文论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话语系统。中西文论体系形态的显著差别在于,西方文论大多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基点,热衷于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因而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家由于“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影响,往往采用笺注式的方式,沿用既有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命题,去阐述电光石火般闪现的精辟见解。当然中国也有像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叶燮《原诗》这样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更多的理论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随感而发,不成体系。究其原因,中西方文学发展的差异是一个根本问题。从中西方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中西文学不乏共同与相通之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是以各自不同的面貌发展着的,因而中西文学的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殊历史轨迹,这种特殊性影响和制约了中西文论的各自发展。在文学的基本观念这一文学理论支点上,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和中国固有的杂文学观念就难以准确对接。中国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体、讲究言志缘情的抒情文学传统,在中国文论中形成了虚实、意境、风骨、神韵、性灵等一整套独特的文论话语系统。西方文学以小说戏剧为主体,强调模仿再现的叙事文学传统,在西方文论中形成了真实、形象、典型、内容、形式等另一套不同的文论话语系统,二者大相径庭。当人们以西方输入的文论观念与系统,重

新设定与裁剪中国文论的有关基本史料,着手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时候,如何在西方文论观念与中国文论的史料之间取得协调,把中国文论史料放进西方文论的框架之中,用一套外来的文论话语体系来表述它们,就必须在辨析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基础上,设法使两个系统的内容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准确对接或置换,而这绝非易事。简单套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一些独特内容进行裁剪,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因此,一方面,学习和掌握西方的文论系统,另一方面,返身到中国古代文论史料中去,寻找二者可以沟通之处,从而构筑一个吸纳西方文论精华、中西交流融合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成为了我们正确对待中西方文论、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反思“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论发展进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大量引进西方文学理论,进而在新时期全面输入西方文论话语的情况下,中国文论中断了传统,失去了创造和自我言说的能力。中国现当代文论从一开始就主要不是在中国古代文论,而是在西方文论思辨传统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基本搁置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感悟方式,代之以充分逻辑化的西方文论思维形式,对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力求作出准确定义,强调对形式逻辑的自觉遵循,注重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追求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完整性与系统性,文学理论的展开过程体现为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连续不断的逻辑运动过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这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文论的基本形态。而当今,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话语似乎已被西方文论的大潮所淹没。西方话语几乎波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它以暴风雨般的强劲势头席卷整个世界。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国文论的声音已被淹没。中国文论话语地位已被西方独霸的事实,激起了当代文论家“中

国文论患了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呼喊,中国文论依然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期望在与西方文论进行交融、对话的同时,完成自己的重建,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占有一隅之地。季羨林先生就说道:“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①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如今已成为“隆重话题”。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界,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的理论指挥棒走,不加分析地引入和一味地机械套用西方文论,这使得中国文论话语完全被遮蔽,当代文坛充斥的尽是西方文论话语。言必称西方,言必称某某主义,似乎只有持此话语方式,才能彰显自身的学术权威。这种对西方文论话语全盘接受的做法,不仅使中国文论渐渐失去了自己传统的理论话语,而且以西方理论切割中国作品本身就有隔靴搔痒之嫌,更无益于因地制宜地建设中国当代自己的文论话语。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中西文论真正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其关键所在就是要加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自主创新意识,积极建设中国自己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只有拥有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文论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参与到世界文论的交流和对话中去。然而,建设中国当代自己的文论话语并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割裂,而是需要我们针对当前世界范围内中西文论共同面临的问题,创造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有益启示,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找到当代中国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面对西方文论,我们要发扬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按照现实需要,有目的、有重点、有选择地借鉴、吸纳西方文论(无论古今)的某些思路、范式,或某些理论框

① 季羨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六期。

架、或某些观点学说、或某些概念范畴、或某些推论方式,即要对西方文论进行筛选、借鉴,因为产生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西方文论肯定不会完全适合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这一借鉴吸收的过程,也正是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交融、对话的过程。中西文论的对话最终将服务于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建设,我们将以古代文论为根基,借鉴西方文论,并通过两者的交融、对话,最终达到融会、共存于世界文论的新的构建中。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理论前沿,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世界,分析、阐释、梳理丰富的传统文论术语,并从中去透视内在的肌理、体系和构架。然后再去寻找中西方文论话语各自的互补优势,明确融合的基础和方向,从而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国文论界只有在整合已有的传统文论话语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思考开创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新局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才能使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共存于世界文坛,从而给世界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当然,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术语是否适合当下文学发展的需要,不仅要看其在理论上自我的现代阐释完成程度、借鉴西方文论与其精华部分进行融合和对话的深入程度,更要看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适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在解读具体的文本时,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当一理论拥有了自己的体系和话语方式,并且无论是面对本土文本,还是面对外来文本,都能够很好地诠释和解读它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一理论是世界性的。很显然,整个当代文论话语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做的。说到底,理论的建设还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文论话语的去留就会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因此,要提倡本土文论话语的使用,使其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得到历练和完善,为中国当代文论

话语重建蓄积资本,储备能量。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尽管还只是刚刚起步,但我们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生机和活力,会对西方话语霸权形成有力的冲击。中国当代文论的话语重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上的,对传统文论的发掘、继承、开拓和创新无疑是重建的重心所在。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教训使我们明白,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以及与其交融和对话,是必不可少的,是充实自身、完善自身、提高自身的有效途径。如果把当代文论话语想象成一棵大树的话,树干和根基就是古代文论的精华,枝叶则是西方文论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使它成为世界文论之林中可以同西方文论分庭抗礼的独具特色的一棵树。

话语分析作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其中的研究是十分热闹和活跃的。话语分析不仅流派纷呈,而且各种新的观点、方法和术语,也在不断地生成和更新之中。如果说存在着某种称作“话语学”的学科的话,那么迄今为止,这门学科则只能是各种五花八门的话语理论累积起来的一个集合体。所幸的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各种话语理论的运用。而所谓话语分析,便就是话语理论在实践中大显身手的一个成果。人们看到,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福柯的见解,包括巴赫金、哈贝马斯、罗兰·巴特、A. 葛兰西、M. 佩奇尤克斯、J. 克里斯多夫、G. 热奈特等话语理论家的见解,都不同程度地被整合到了对话语实践案例的解剖中,话语分析由此渐渐成为一个颇具学术创新潜力的研究领域。话语分析就是对话语的分析,它天然地包含了将语言使用当做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这样一个常识性的认知。任何话语都包含五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即任何话语都是说话人(作者)、受话人(读者)、文本(被议论者或事件)、沟通(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通过文本阅读而达到的相互了解或融洽状态)、语境(话语行为发生的特定社会关联

域)这五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对一个话语含义的完整理解,自然而然地也就是对话语各个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们认为,话语构成要素既是话语分析的切入点,也搭建起了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由于语境可以作为表述意义必要的组成部分而进入话语,因而语境也应该被纳入到话语分析的框架之中。总括起来,在这个框架中,话语分析所要追问的就是,谁在说话?言说什么?在怎样的情景下言说(历史语境)?对谁言说(读者)?如何言说(表述形式)?这些话语的内部构成要素共同作用,塑造出特定的话语形态。

话语理论的核心人物福柯则更进一步指出话语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起实践作用的话语关系体系就是在经济和社会机制、过程、行为方式、规范体系、技巧、分类类型和特征化方式之间确立起来的,它并不出现在对象中,却限定对象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这些关系体系就是一个内在于实践并限定其特殊性的规则整体。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诸对象成为一个话语的对象并由此构成其历史呈现的条件。话语作为实践就能呈现出规则整体,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谈论的对象,正是这两个重要规定性才使得话语不止是用符号来指称事物的语言和言语。福柯的话语理论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分析文化和社会。在福柯眼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的符码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号建构物。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去分析人们言谈时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认可或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

由于话语对象不像一般语言符号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指涉目标,于是福柯选择了话语事件作为话语分析的出发点。话语事件

的描述提出的是以下问题,即: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为何不是其他陈述。他指出,话语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则性,而其规则性只存在于话语实践中,而无关于主体意识的独创性;我们始终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在话语的范围内,从话语本身出发,去把握偶然系列的事件得以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而不应苦苦搜寻话语的内在意义核心。

福柯还认为,话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痕迹。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判定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福柯的权力理论告诉我们,知识在社会中要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控制。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都源于这个社会中的权威、规则、等级和学科系统,因此,一种文化必然产生出一种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正是这种认识方式导致相应的话语被生产出来。如在每种文化中都有关于话语的真伪、正误、合理与不合理的准则,这些准则正是权力的产物。因此,任何话语,包括文学的话语,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律或自治的,而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乃是权力的话语。然而,权力关系对话语的决定作用只是话语本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中,话语不可能只有一种完全和谐统一的声调,借用巴赫金的话说,即通常存在着多音齐鸣的“复调”现象,甚至有不和谐的抗议的声音。话语除了有服务于权力的一面外,还有抗拒的一面,后者常常被西方的理论家称之为“颠覆”。我们必须看到,任何社会都有其处于权力地位的文化存在。但是,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与冲突,正是这种文化内部的张力与冲突造成了不同的文化话语生成的缝隙与空间。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不同的生产,或

者维护现存权力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抗拒和批判它,抑或通过某种变相的方式与权力文化合谋。中西方文论话语对权力就有着这些不同的回应。文论的话语是主体的话语,而主体又是权力的主体,那么,文论的话语也就是权力的话语。所以,从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方式,就可看出话语主体的社会文化权力的渗透。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总结: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与文论能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话语系统,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制,从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清理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规则,然后才可能进一步清理古代文论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运作机制和文化与文论的发展规律。由于这种文化探源式的研究,是从文化基本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入手,因而不但具有探本求源的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是一条追寻东西方文化生成运作机制和规律的切实可行的路径。从这条路径,我们不但可以比较东西方异质文化圈的不同文化精神,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类文化生成与运作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东西方文论特征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给当今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一种“活的”文化运作机制和规则。只要我们能真正认识到这种文化运作机制与规则,那么不但可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为建构新的文论体系,或者说建构一般的(或总体的)文论体系提供若干“活生生的”学术规则和运作方式,而不仅仅是提供一堆“死的”材料。作为文论史固然要借鉴古人,要研究“秦砖汉瓦”、“古希腊、罗马”、“吠陀、奥义书”等等“死的”

材料,但我们更需要从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规则,发现其“活的”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同时,也只有探索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的同时,才可能真正进行深入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真正回答清楚东西方文化为什么会“分道扬镳”的基本原因;也才可能真正认识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不同路径、文论特色及其互识的必要性和互补的巨大价值。因此,要解决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问题,就必须了解中西方文论话语的特点。因为只有了解和认识了传统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才能继承、借鉴、吸收中外文化的合理因子,重建起适应于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平等对话语境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而在两种文论话语的比较中,抓住中外话语不同的语言层面、思维模式、话语文化规则、话语空间构造、话语语境、话语主体的精神建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等方面来做比较,是最能接触话语要质的几个层面。分析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在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时,找到最具体、实在的路径。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中西方文论话语绝不可互相替代的根本原因所在,进而更清楚地认识两种异质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